

# 半碗豆腐脑

◇ 安玉芹

7点是吃早餐的高峰期,老张的店里没来几个人,早起烙的烧饼也凉了。老张看了看对面那家新开的豆腐脑店,不断有人进进出出,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。

老张做豆腐脑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,从选豆、泡豆到豆腐脑成型,老张从不许别人插手。老张做的豆腐脑白如美玉、嫩如凝脂,用勺子一撇,一层豆腐脑薄如纸张。几层豆腐脑入碗,浇上一大勺滚烫的卤子,再加上一勺喷香的辣椒油,香菜在上,茶蛋入底,配上酥脆掉渣的烧饼,就是一顿美味的早餐。

前段时间物价上涨,其他店的豆腐脑从一块涨到了一块五,老张也想涨点钱。扫大街的刘姐吃得正香,听说要涨钱,脸色黯淡下来。老张的心,被长长的叹息声砸出个洞,他打消了涨钱的念头。

忙忙碌碌的日子,老张很知足。突然有一天,对面开了一家豆腐脑店。起

初,老张没在意,论做豆腐脑,他还真没服过谁。可是几天后,他就沉不住气了。对面的豆腐脑店开起了直播,打着书画之乡特色小吃的招牌,吸引了许多人,老张店里的顾客却越来越少。

想到这些,老张的胸口就发闷。这时门帘一挑,进来一个青年,问:“半碗豆腐脑卖不卖?”

老张一愣,心想:“一块钱一碗的豆腐脑也吃不起?”半碗豆腐脑,老张也卖过,可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

“卖,卖!”老张答应着。他一边用勺子向碗里撇豆腐脑,一边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人,他长相斯文、穿戴整齐,不像是落魄之人。

来人要了两个烧饼,挖了一勺辣椒油倒进碗里,慢慢吃起来。他边吃边自言自语,都是对豆腐脑和卤子的评价,老张心生奇怪:“这咋像是来找茬的?”

也许是饿了,也许是豆腐脑太好喝了,一个烧饼还没吃完,年轻人就把碗中的豆腐脑捞了个干净,只剩下碗底的卤子,透亮得能照出人影。年轻人嚼着烧饼,抬头问老张:“添卤是不是不要钱?”

老张没回过神来。年轻人又问了一遍:“喝豆腐脑添卤不是不要钱吗?”

“是,是,不要钱,尽管添。”老张忙不迭地回话,向年轻人碗里添了两勺卤子。

年轻人临走时,吧唧着嘴,说:“这样爽滑的豆腐脑,天天喝也不腻。”老张觉得这人有点奇怪,又说不出哪里怪。

第二天,年轻人又来了,又要了半碗豆腐脑,加了一次卤。如此持续了一周。

这天,年轻人坐在老张对面,笑嘻嘻地问:“大伯,您不认得我了?”老张揉了揉眼睛,摇摇头:“咱俩认识啊?”

“认识。现在我是你的同行,对面豆

腐脑店的老板;20年前,我是你店里的小顾客,天天带着干粮来你这蹭豆腐脑喝,有时候要半碗,中间再添两次卤,也有不要豆腐脑光要卤子的时候,还要添几勺辣椒油,你从没嫌弃过。”年轻人说。

听说是同行,老张的脸拉得老长,再听说是20年前的小顾客,老张的嘴角微微上扬。当年蹭豆腐脑喝的毛孩子很多,对面这个人,老张并不记得是哪一个,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。

年轻人见老张不断搓着双手,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,忙站起来,拉着老张的手,说:“我去过很多地方,觉得其他地方的豆腐脑不如咱本地的豆腐脑正宗,就开了直播想把这一地方小吃推广出去,我觉得您家的豆腐脑最好吃,想请您把关工艺。”

听到这,老张的手心里湿漉漉的,心里暖乎乎的……

# 老夫老妻

◇ 张晓燕

李姐的公婆两个月前从乡下搬来县城,在她的小区租了一间房。租房住是老两口要求的,李姐和老公也只好依着他们。

以前,李姐曾多次劝公婆搬到城里,彼此有个照应,都被公公拒绝了,说是“不习惯,花销也大”。李姐的公公特别节俭,脾气也倔。他在企业退休,工资两千元左右,比教师退休的老伴少很多。李姐的公公把两人的工资卡都攥在手里,李姐的婆婆花钱都得向他张嘴,就连去药店刷医保卡买两盒药,她公公也得一一对证。

有一次,李姐的婆婆来她家小住,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旧手绢,拿出20元钱,塞到了孙子手里。李姐站在旁边连说:“不要不要。”婆婆忙说:“你是嫌

少吧?你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,要不是今天往你这儿来,这些钱他都不给我。”说着眼圈都红了。李姐笑着说:“我都知道,爸爸太节省了,不过你也不能这么顺着他。”婆婆叹口气:“你爸年轻时受穷受怕了,总想着给你们多留点儿。他身体不算壮,我要是跟他理论起来,他那么大的脾气,我怕他气病了。”看着婆婆一脸委屈,李姐也跟着叹气。

前阵子,李姐的婆婆突然得了脑梗,治疗后虽无大碍,人却消瘦了,走路踉跄,手也酸麻发抖,干家务都成了问题。李姐公公的生活起居一直都由她婆婆照料,婆婆的身体变成这样,两个人的日常生活怎么办呢?就在李姐夫妇为此担心时,她公公却一改往日

“甩手大掌柜”的作风,干起了家务。他不但学会了做家常菜,还学会了和面蒸馒头,而且不再发脾气,和老伴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。

一次,李姐夫妇回家探望时,她公公提出要搬到县城居住,这让李姐感到有些惊讶。她公公说:“你娘万一哪天不好了,我一个老头子在家也没啥办法,离你们近一些,去医院方便。”就这样,李姐的公婆搬到了县城。

搬来县城后,李姐的公公每天带着她婆婆出去散步,坐下歇息时,还时不时给她婆婆捏捏手、捶捶腿。有一次被李姐遇到了,她公公还有点不好意思,说:“你娘说给她捏捏得劲儿。”

李姐转过头,偷偷笑了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去了南方。临走前一晚,我告诉爷爷奶奶不用早起做饭,我在车上随便吃一口就行。第二天,他们起得比我还早。我睁眼的时候,二老已经把香喷喷的饭菜做好了,有我爱吃的拔丝地瓜、苦瓜煎蛋、糖醋排骨、红烧鲫鱼,还有一盘饺子。爷爷说上车饺子下车面,非让我把饺子都吃了。

爷爷奶奶把家里的灯全打开了,屋里屋外灯火通明。奶奶平时很节俭,能不开灯就不开灯,爷爷夜

读备课也只是开个小台灯。我上小学那会儿比较淘气,上蹿下跳,常常磕破衣服。一觉醒来后,我总能看到奶奶点着蜡烛给我缝衣服。奶奶眼睛花得早,她常常要穿好几次针眼,缝的时候也总是用手揉眼睛,一不小心还会扎破手指,她忍着不出声,怕吵醒我。

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,父母看不过来,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,他们含辛茹苦地培养了我20多年,如今,我要离开他们了,心里满是不舍。

二老做这一大桌子菜至少要五六个小时,怕是半夜就起来了,我心里很是感激。爷爷看出了我的心思,在一旁宽慰我,说不必惦记家里,他和奶奶身体都很好。吃完饭后,我拿起行李,一口气走出家门口好远,到桥头的时候,我忍不住回了头,看到家里的灯光和二老的轮廓。

多年后的某一天,我接到一份急电,爷爷病危。我急匆匆赶到家时,爷爷已经走了。满屋烛光照在他的脸上,有些凄冷。爷爷走后不久,奶奶也跟着走了,小屋的灯光再也没有亮起。

时间的年轮已走过了40圈,那些灯光里的故事,变成了黑白胶片里发黄的往事。每当我看见寻常百姓家的点点灯光,总会想起小屋中的灯光,昏黄的光晕映照

着爷爷奶奶的笑脸,温馨如初。

# 小屋的灯光

◇ 范大悦

# 我的工分情结

◇ 高明久

初中毕业那年,我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,驮起被子回到了家乡,脱下学生装,开始下地干活。

父亲告诉我,家后小坑边槐树上的钟声一响就要上工,在那里听队长派活。

第一天的劳动过去了。吃完晚饭,我正想坐下看书,父亲递给我一个小本:“这是记工本,一会得去草屋(生产队的牛棚)记工分。”

乡亲们都在草屋等记工员记工。轮到我了,记工员广玉见我第一次记工,便对我说:“三叔(广玉小我一辈,我在兄弟间排行老三),我给你说说记工的原则。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,分整劳力和半劳力,男的18—60岁、女的18—45岁为整劳力,小孩、老人和残疾人是半劳力。整劳力一天记一个工,早晨2分,上午、下午各4分。半劳力减半记。”

我看了看,记工本上有年、月、日,早晨、上午、下午,劳动内容摘要,记工员盖章。

有一天,我和广玉合打畦田,聊起了工分的事。“工分是你的劳动报酬,是粮食分配、秋后算账、年终决算的依据。”广玉说,但我懵懵懂懂。

麦收后,家家户户都带着布袋去场里分粮食。队长四叔先组织有力的人估量斤数,然后把百分之七十按人头分下去,百分之三十放进仓库里待秋后算账时找补。

秋后算账,有“人七劳三”和“人六劳四”两种分配方案。至于按照哪个方案执行,生产队里召开群众大会征求意见。由于每家的人口组成、年龄大小、劳力多少不同,就出现了余粮户和缺粮户,队员年年围绕两种分配方案争执不休。劳力多的余粮户愿意采用“人六劳四”分配,缺粮户则赞成“人七劳三”。吵归吵,争归争,最后还是由队长决定。我在家的几年里,四叔多数定的是“人七劳三”。

年终决算,就是把分得的粮食按国家规定的平价价格计算出金额。会计汇总各家各户的工分,每个工按一

毛钱工值,计算出每家的工分总值,工分总值减去分得粮食的钱额,就出现了余粮户和缺粮户。余粮户分钱,缺粮户交钱。那些“一头沉”的户(即在外工作的干部、工人、教师,只有家属、孩子或者父母在家的),可以拿钱买工分。

我慢慢明白了“工分工分,老农民的命根”这句话的真正含义,因为工分直接决定着各家的粮食分配、各户的贫富程度以及各户的幸福指数。

为了挣工分,上午放了工后,我就挎着篮子去割草,再把草交给队里喂牛,以草换工分。碰上草多的时候,一个中午能挣整劳力一上午的工分。在冬天,我就和广勤看仓库,睡在半阴半阳的窝棚里。麦收时节的晚上,我就和二堂、清瑞、广勤去看场,以此来弥补我家工分不足的问题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那段挣工分的岁月,我至今难以忘怀。割草的草友、看仓库的伙伴、打畦田的小伙计,也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。